

风险事件经历与家庭消费行为^{*}

——基于群体性和个体性差异的视角

路晓蒙¹ 陆艺升² 李亚玲³

摘 要 本文从群体性和个体性差异的视角入手,对比研究了两种类型风险事件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基于 CHFS 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5 轮非平衡面板微观家庭数据,本文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截然不同: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其总消费尤其是医疗消费显著增加,而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其消费行为并无显著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受到的政府救济不足且社会互动较少,这是经历两类风险事件家庭的消费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经历风险事件后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在不同家庭抚养负担、政府医疗保障水平以及社会特征下也存在差异。本文的结论强调了政府救济和社会互动对家庭消费行为的积极作用,并呼吁政府在制定风险处理措施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风险的差别。

关键词 群体性风险经历;个体性风险经历;家庭消费

0 引言

重大风险事件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关注,不仅因为近些年的重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风险事件经历对人的行为存在重大且持续的影响。如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影响家庭投资行为(Hoffmann et al., 2013; Guiso et al., 2018)、早年饥荒影响家庭储蓄、创业行为(程令国和张晔, 2011; 汪小圈等, 2015)、地震影响家庭消费或保险行为(卢晶亮等, 2014; Gao et al., 2020)、特别重大事故影响家庭保险行为(许荣等, 2020)等。

基于物质维度和社会维度的风险分类标准,家庭经历的各类重大风险事件,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Luhmann, 2017)。群体性风险事件指某一特定群体同时经历的风险事件,如自然灾害——地震、海啸、台风、山体滑坡等。个体性

^{*}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风险经历与中国家庭金融行为研究——基于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视角”(基金号:72003149)的资助。

¹ 路晓蒙,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mail: luxiaomeng@swufe.edu.cn。

² 陆艺升(通信作者),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E-mail: luys0724@163.com。

³ 李亚玲,四川银行投资银行与战略客户部职员, E-mail: yuesheng711@outlook.com。

风险事件指某特定家庭经历的事件,如火灾、车祸、重大疾病和突然破产等。两类风险事件都对家庭有重要影响,但两类风险事件之间也存在重大区别,除了涉及面广和窄的形式区别,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群体性风险事件受到的社会救济更多、社会属性也更强。对于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来说,由于具有某类相同特征的为数众多的家庭共同经历了风险事件,他们往往会受到社会 and 政府的关注与救济,这些家庭之间的沟通、互动也会更多。已有研究发现,社会 and 政府的关注与救济通常对家庭的经济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能缓解冲击后果以及增强家庭对风险的控制力(李华强等,2009;卢晶亮等,2014)。社会互动多的家庭经常沟通、交流,其经济行为总是会相互影响且相互趋同(李涛,2006;Hu, 2022)。反过来,当家庭经历的是个体性风险事件时,家庭较少得到来自社会 and 政府的关注与救济,与外界的互动也相对较少,此时家庭更多依赖于以往自身的经验和认知来决定其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纵观已有文献,虽然学者们已经从多角度考虑了重大风险经历与家庭的各種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大多研究仅关注于某一类风险事件,例如地震、饥荒之类的群体性风险事件,或特别重大事故这类个体性风险事件,并未把家庭的群体性风险事件经历和个体性风险事件经历放在一起比较,没有考虑两者在政府救济和社会属性上的根本区别。本文则把两类风险事件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特别从政府救济差异和社会属性差异的视角探讨两类风险事件经历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

在家庭丰富多样的经济行为中,本文重点关注家庭的消费行为。一方面,消费是家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从绝对收入假说(Keynes, 1936)到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 1949),再到生命周期假说(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和永久收入假说(Friedman, 1957),消费理论的持续深化与拓展,反映出了消费在家庭经济行为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模式面临瓶颈,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家庭消费行为及其驱动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9年五轮覆盖全国29个省、353个县、75535户追踪家庭、148524个样本的混合面板追踪数据,探讨了群体性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在家庭消费行为方面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截然不同:相比群体性风险事件,在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后,家庭的总消费尤其是医疗消费显著增加。这一结果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表明了结果的可靠性。作用机制方面,本文数据显示群体性风险事件后更多的政府救济和社会互动,是导致两类风险经历存在差异性影响的主要原因。

本文还进一步从家庭抚养负担、政府医疗保障水平以及家庭是否住在城市这三个角度对上述结果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首先,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在遭受群体性风险事件后医疗支出显著增加,而个体性风险事件下影响不显著,说明抚养负担加剧了家庭的脆弱性,政府救济和社会互动难以完全抵消群体性风险冲击的影响。其次,政府医疗保障水平在缓解风险冲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居住于医疗保障水平较高地区的家庭在经历两类

风险事件后非医疗消费均显著提升,表明公共医疗体系在群体性和个体性风险事件下均具有稳定器功能。最后,从居住地特征来看,城市家庭由于社会网络较弱、互助渠道有限,在个体性风险事件后医疗消费增长更为显著,而农村家庭可通过社会关系部分吸收风险冲击。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直接分析风险经历的文献。尽管国内少量文章研究个人早期经历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如早年饥荒经历提高了储蓄率(程令国和张晔,2011)、降低了创业积极性(汪小圈等,2015),但这都是基于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分析,基于个体性风险经历的分析尚不多见,且未能把群体性的风险经历和个体性的风险经历事件区分开来。第二,本文首次从家庭层面识别了某家庭是否经历了重大风险事件,丰富了已有研究的识别策略。已有文献在判断家庭是否经历风险事件时,一般以某地某时期发生的风险事件来认定家庭是否经历了风险事件,并未能精确识别家庭是否真正经历了该风险事件。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可以直接识别出家庭是否真正经历了风险事件,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1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大量研究表明,风险事件对家庭经济行为存在影响。这些研究主要通过实验研究、交易数据和调研数据等,研究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事件对家庭或个人储蓄、创业、投资等经济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储蓄方面,程令国和张晔(2011)基于我国1959年至1961年中大饥荒事件,发现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更倾向于提高储蓄率。在创业方面,汪小圈等(2015)发现幼年经历较为严重饥荒的个人更不倾向于进行创业。在投资方面,许荣等(2020)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交通事故和矿业事故等特大事故的发生将显著降低家庭主观风险偏好,抑制家庭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和实体工商业的投资。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重大风险事件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方向一直存在不同的讨论。部分研究发现人们在经历极端风险事件后会更加偏好风险(Hoffmann et al., 2013);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家庭在经历极端风险事件后会更加规避风险(Guiso et al., 2018; Pool et al., 2019)。

近几年的研究从不同风险情景的角度出发,以解释这种差异,并发现重大风险事件对家庭或个人的影响程度,会因家庭或个人特征、同一事件中的经历差异以及预期与现实的差异而不同。如Hibbert et al. (2018)发现遭受损失后,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向于避免投资股票。Imas(2016)发现,个体投资者在经历了账面损失后会承担更高的风险,但经历实际损失后会更加规避风险。此外,Bernile et al. (2017)发现经历过重大灾难而没有遭受极端后果的CEO会表现得更激进。Gao et al. (2020)从时间维度上的相对损失(实际损失和预期损失之间的差异)这一视角研究了地震中的“幸运经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经历致命地震的家庭会自我强化感知到的风险,但如果家庭实际损失低于预期损失,他们往往会降低风险感知。

1.2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家庭经历了风险冲击后的经济行为如消费、投资和保险行为等的研究已然非常丰富,但尚未有文献将重大风险事件区分为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如引言中所述,群体性风险事件多为某群人一同经历的重大事件,虽影响深刻但社会属性更强;个体性风险事件仅为某家庭经历的单个事件,发生时只能自己根据经验和预期处理。当家庭经历群体性的风险事件后,由于受到的社会关注更多,得到的政府救助、和社会互动也会更多。根据已有文献的发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与救助能缓解冲击后果(李华强等,2009;卢晶亮等,2014)。因此,本文推测,家庭在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后并不会调整其消费行为。反而,当家庭经历了某种特定的个体性风险事件时,家庭更多依赖于以往自身的经验和认知来做决策,可能更会调整其消费行为。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 相比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的消费行为变化更大。

导致家庭消费行为变化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风险事件及其产生后果的差异。群体性风险事件属于公共事件,影响范围广,政府通常有相应的系列应急措施、救济政策和医疗保障,受灾家庭会受到政府的统一援助。相比之下,经历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很难直接获得政府的救助。现有文献表明政府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家庭遭受的损失,导致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更小(卢晶亮等,2014)。因此,政府救济水平的不同可能是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显著不同的原因之一。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 政府救济可能是经历群体性风险与个体性风险的家庭在消费行为变化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现有文献表明,社会互动的互助功能、风险分担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对家庭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降低家庭消费的不确定性(易行健等,2012;章元和黄露露,2022)。虽然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也可能通过与亲朋好友的社会互动得到帮助,但群体性风险事件多为某群人一同经历的重大事件,互不相识的家庭可能因风险事件而连接在一起,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互动。因此,由于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家庭在经历两种风险事件后的社会互动水平变化不同,最终导致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不同。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 社会互动可能是经历群体性风险与个体性风险的家庭在消费行为变化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2 数据、模型和变量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的数据展开研究,该数据全面覆盖家庭人口特征、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保险与保障、就业与主

观态度等信息。路晓蒙等(2017)依据 Campbell(2006)提出的五大数据库质量标准,证实 CHFS 在数据代表性、资产类别完备性、资产具体性、数据准确性和持续性^①方面表现优异。

2019年,CHFS在问卷中详细询问了家庭经历的重大风险事件是什么以及重大风险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结合 CHFS 2011—2019年五轮数据,本文能够从空间和时间维度上观测到风险经历后家庭行为的变化,这一面板数据结构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提供了基础。

CHFS 2011—2019年五轮数据覆盖了全国 29个省、353个县、75535户追踪家庭、148524个样本。参照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只保留了户主年龄大于 16岁的家庭,剔除只有一年调查数据以及风险经历发生在接受调查之前的家庭。由于有过风险经历的家庭占全样本比例很少,仅 7.66%,为保证样本可比性,本文使用 PSM 方法匹配家庭。本文对每个家庭风险经历前一期的协变量进行匹配,使用 0.05 卡尺内有放回的一对一匹配,协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学历、户主就业情况、户主是否在政府机关工作、家庭规模、老人抚养比例、小孩抚养比例、家是否住在东部地区、家是否住在西部地区、家是否住在城镇、家庭住房数、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家庭财富。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家庭没有显著的特征差异。^②最终,本文共收集 3812 个家庭共 12483 个样本,经历过风险的家庭共 1946 个,其中经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有 557 个,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有 1389 个。^③个体性风险经历的家庭中,有 76% 的家庭经历了重大疾病风险,13% 的家庭经历了车祸,剩下 11% 的家庭经历了家庭破产。

2.2 描述性统计

本文衡量家庭消费行为的重要变量有家庭总消费、医疗消费以及非医疗消费。家庭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和奢侈品消费,剔除了总消费为负数的样本,然后对总消费进行了 1% 缩尾,并做了对数化处理。医疗消费是家庭用于医疗的消费额并做对数处理,非医疗消费则是总消费剔除医疗消费后的消费额并做对数处理。

图 1 展示了 2011 年到 2019 年家庭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的情况。家庭总消费每年都在增长,每户家庭每年平均总消费从 2011 年的 3.2 万元到 2019 年的 7 万元,家庭总消费实现了翻番。其中的阴影部分展示了家庭每年医疗消费的平均水平,从 2011 年的 0.3 万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3 万元,医疗消费占比也从 2011 年的 10% 增加到 2019 年的 19%。家庭医疗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越来越高的占比,使得医疗支出成为了家庭支出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探究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否有差异,本文首先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初步探索。因每个家庭经历风险的年份不同,只能选择代

① 如 2015 年追踪 2013 年样本率、2017 年追踪 2015 年样本率均达 80%,2019 年追踪 2017 年样本率达 50%。

② 囿于篇幅,PSM 匹配效果留存备索。

③ 囿于篇幅,更详细的样本情况说明留存备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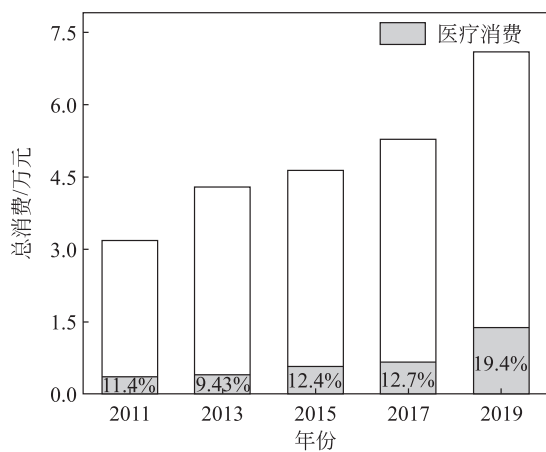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19 年家庭消费变化情况

表性年份对样本进行分组。2018 年经历风险的家庭最多,占到风险经历家庭总数的 43%,但由于 2018 年并非调查年份,因此本文以 2019 年为代表性年份,定义 2019 年之前为风险经历前,2019 年为风险经历后,将风险经历发生在 2018 年及 2019 年的家庭作为处理组,剩余家庭为对照组。分别对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的家庭的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的双重差分进行描述性统计,表 1 展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结果显示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在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上存在显著变化,但经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没有显著变化。在风险经历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分显著是因为对照组中还包含了在 2018 年之前经历了风险的家庭样本,这两组存在差异并不重要,本文更关心的是双重差分的结果是否存在差异。从双重差分的结果上来看,经历个体性风险和经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在风险经历后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的变化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检验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本文接下来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多期三重差分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

表 1 描述性统计

Panel A: 经历群体性风险家庭					
变量	时间	控制组	处理组	差分	双重差分
总消费	经历前	10.4080	10.5518	0.1438**	0.0490
	经历后	10.3714	10.5642	0.1928***	
医疗消费	经历前	7.1919	7.4113	0.2194	0.0824
	经历后	7.2863	7.5881	0.3018**	
非医疗消费	经历前	10.2707	10.3607	0.0900	0.0518
	经历后	10.2285	10.3703	0.1418***	
Panel B: 经历个体性风险家庭					
变量	时间	控制组	处理组	差分	双重差分
总消费	经历前	10.5239	10.6771	0.1532***	0.2025***
	经历后	10.5494	10.9051	0.3557***	

续表

Panel B: 经历个体性风险家庭					
变量	时间	控制组	处理组	差分	双重差分
医疗消费	经历前	7.3238	7.6216	0.2978***	0.5999***
	经历后	7.8778	8.7755	0.8977***	
非医疗消费	经历前	10.3877	10.4752	0.0876*	0.1101***
	经历后	10.3284	10.5261	0.197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2.3 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设定如下多期 DID 模型探究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Y_{i,t} = \alpha_i + v_t + \beta^1_{i,t} \text{GRisk_experience}_{i,t} + \beta^2_{i,t} \text{IRisk_experience}_{i,t} + Z'\gamma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_{i,t}$ 为被解释变量,主要指家庭总消费、医疗消费以及非医疗消费。 $\text{GRisk_experience}_{i,t}$ 表示家庭 i 在第 t 期是否经历过群体性风险事件,将群体性风险事件发生当年及其之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text{IRisk_experience}_{i,t}$ 表示家庭 i 在第 t 期是否经历过个体性风险事件,将个体性风险事件发生当年及其之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Z' 表示控制变量,参考家庭风险经历与家庭经济行为相关文献,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其中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及年龄平方、性别、婚姻情况、学历水平、就业情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是否住在城镇、家庭住房数、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家庭财富。模型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 v_t 和家庭固定效应 α_i 以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影响的分样本检验结果,^①其中前三列展示了基于群体性风险与无风险样本的检验结果,后三列展示了基于个体性风险与无风险样本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经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其消费水平和结构没有显著变化,而相比于无风险样本,家庭经历个体性风险后总消费支出上升,特别是医疗消费显著增加。由于风险事件往往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需要承担经济后果,从而导致家庭的消费支出特别是医疗消费支出明显增多。家庭的总消费显著增加意味着家庭的储蓄率减少,与已有文献(程令国和张晔,2011;汪小圈等,2015)发现过去风险经历导致家庭储蓄率更高的结论不同,这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风险经历前后家庭消费行为在时序上的短期变化,而以往文献主要关注风险经历后不同家庭的经济行为在横截面上的长期差异。

为比较群体性风险与个体性风险之间的差异,表 3 列(1)至列(3)使用全样本进行检验,为了直接比较不同因变量下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列(4)至列(5)进一步将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进行 Z-Score 标准化处理。结果显示群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的消

① 本文也对标准化后的总消费、医疗消费和非医疗消费进行了检验,囿于篇幅,结果留存备索。

费水平和结构没有显著影响,而个体性风险经历显著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且对医疗消费的提升作用最强。表 2 和表 3 的结果综合体现了群体性风险经历与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表 2 风险经历与家庭经济行为:分样本结果

样本	(1)	(2)	(3)	(4)	(5)	(6)
	群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群体性风险经历	0.0526 (0.0451)	0.0380 (0.1853)	0.0640 (0.0465)			
个体性风险经历				0.2140*** (0.0257)	0.9404*** (0.1138)	0.0662** (0.0259)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样本数	3392	3392	3392	8622	8622	8622
R ²	0.671	0.499	0.686	0.703	0.510	0.72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表 3 风险经历与家庭经济行为:全样本结果

样本	(1)	(2)	(3)	(4)	(5)	(6)
	全样本			全样本(变量标准化)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标准化总消费	标准化医疗消费	标准化非医疗消费
群体性风险经历	0.0181 (0.0346)	-0.0308 (0.1502)	0.0261 (0.0352)	0.0199 (0.0380)	-0.0099 (0.0481)	0.0272 (0.0367)
个体性风险经历	0.2326*** (0.0244)	0.9864*** (0.1059)	0.0863*** (0.0248)	0.2553*** (0.0268)	0.3157*** (0.0339)	0.0900*** (0.0259)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Y	Y	Y
样本数	12035	12035	12035	12035	12035	12035
R ²	0.696	0.507	0.716	0.696	0.507	0.716

注:标准化变量是指经过 Z-Score 标准化后的变量,***、**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3.2 稳健性检验

虽然利用 PSM-DID 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为进一步提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并排除非风险经历因素可能引致的个体性风险经历与家庭消费变动之间的伪相关,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 首先,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结果显示,风险经历前的时期虚拟变量与个体性风险经历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基本不显著,表明在经历个体性风险之前,家庭消费行为无明显变化,满足平行趋势假

① 囿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设的要求。

其次,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与家庭消费紧密相关,本文在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加上无风险经历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剔除了经历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的家庭的所有观测值,再次进行检验。此外,本文还利用 2017 年和 2019 两年的子样本构建两期模型进行检验,处理组只考虑风险经历发生在 2018 年的家庭,2017 年为风险经历前,2019 年为风险经历后。结果显示个体性风险经历仍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结果是可靠的。

最后,为了排除随机性和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将处理组随机化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同样利用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加上无风险经历样本中 2017 年和 2019 两年的子样本,随机选择家庭作为“伪处理组”,从而获得随机个体性风险经历的系数。此过程重复 1000 次,然后观测随机个体性风险经历系数的核密度图。结果显示,随机个体性风险经历的系数分布在零的附近,且个体性风险经历的真实系数位于系数分布的尾部,符合安慰剂检验的预期,进一步表明本文结果的可靠性。

4 渠道分析

为了探究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本文从政府对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的救济差异,以及社会互动差异这两个方面来展开具体分析。

4.1 政府救济

根据研究假设 2,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的消费行为有显著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获得了政府救济。政府在重大灾害事件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重大群体性风险事件后,政府通常有相应的系列应急措施、救济政策和医疗保障,受灾家庭会受到政府的统一援助。但是,若没有家庭的主动申报,经历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很难直接获得政府的救助,因此,政府的灾后救济会更倾向于经历群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为了验证这一渠道,本文使用 CHFS 数据检验了家庭遭受不同风险事件后获得的政府救济的差异。具体来说,CHFS 的调查问卷会询问家庭是否收到了政府的救济金和赈灾款,根据这个问题,本文匹配了家庭的风险经历与收到政府救济金和赈灾款的经历。表 4 结果显示,相比于个体性风险,经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确实收到了更多的政府救济。

表 4 渠道分析:政府救济

样本	(1)	(2)	(5)
	群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全样本
变量	政府救济		
群体性风险经历	2.1363 *** (0.2114)		2.4034 *** (0.1636)

续表			
样本	(1)	(2)	(5)
	群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全样本
变量	政府救济		
个体性风险经历		1.5397*** (0.1773)	1.4140*** (0.1552)
控制变量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3540	8932	12472
R ²	0.125	0.066	0.09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4.2 社会互动

根据研究假设3,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影响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社会互动不同。群体性风险事件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家庭在风险经历后的社会互动会增加更多。为了验证这一渠道,本文检验了家庭遭受不同风险经历是否导致了社会互动的变化不同。本文借鉴郭士祺和梁平汉(2014)的研究,将家庭通讯支出作为社会互动的测度,家庭的社会互动增强会体现在话费和网络费用的增多。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在风险事件后,经历了群体性风险的家庭的通信费用出现了明显的增加,社会互动显著增加,而经历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的社会互动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群体性风险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一方面,群体性风险事件后相关资讯、信息会增加,家庭会受到社会其他群体、媒体和政府的关注;另一方面,家庭之间也会进行信息传递,加入聊天群、贴吧、论坛等,因此,群体性经历后家庭与外界联系增加、社会互动增加。相比之下,经历个体性风险后家庭的社会互动范围与平时基本相差不大,所以并没有导致家庭社会互动水平的变化。

表 5 渠道分析:社会互动

样本	(1)	(2)	(5)
	群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个体性风险经历样本+无风险经历样本	全样本
变量	社会互动		
群体性风险经历	0.1804*** (0.0688)		0.1477** (0.0704)
个体性风险经历		0.0188 (0.0534)	0.0020 (0.0493)
控制变量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3496	8830	12350
R ²	0.654	0.616	0.62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5 异质性分析

5.1 家庭抚养负担

家庭抚养负担一直是家庭金融领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抚养压力上升,探究不同抚养负担的家庭面对风险事件时消费行为的变化显得愈发重要。一般来说,抚养负担重的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会更弱,风险事件产生的经济后果也会更加严重。本文使用家庭抚养比来衡量家庭的抚养负担,与以往的文献一致,家庭抚养比定义为:(1-劳动力人口/家庭成员数)。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在抚养负担较重的情况下,群体性风险经历会增加家庭的医疗消费,表明政府救济难以完全抵消群体性风险对抚养负担较重家庭的冲击,政府对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可能存在救济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对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进行重点关注,并在其面临风险事件时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救济。由于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自身已经承担了大部分的冲击,抚养负担对这类家庭的消费行为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表 6 异质性分析:家庭抚养负担

样本	(1)	(2)	(3)
	全样本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群体性风险经历	-0.0412 (0.0480)	-0.2988 (0.2043)	-0.0168 (0.0489)
家庭抚养比×群体性风险经历	0.2085** (0.1063)	1.0154** (0.4529)	0.1517 (0.1085)
个体性风险经历	0.2102*** (0.0355)	1.0476*** (0.1514)	0.0844** (0.0363)
家庭抚养比×个体性风险经历	0.0838 (0.0587)	0.1101 (0.2500)	-0.0123 (0.0599)
家庭抚养比	-0.0716 (0.0446)	0.1518 (0.1900)	-0.0947** (0.0455)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11206	11206	11206
R ²	0.676	0.506	0.69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5.2 政府医疗保障水平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各种疾病风险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政府医疗保障制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不断更新,虽然目前基本医保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但是该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各地区的报销起付线、报销比例等政策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不同。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各省每年医疗

卫生财政支出数据来衡量各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并对每年政府医疗卫生财政支出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表 7 汇报了政府医疗保障水平对风险经历家庭消费行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不论是在群体性还是在个体性风险经历之后,居住在医疗保障水平更高的省份的家庭其非医疗消费更高,体现了政府财政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在重大风险事件发生后的医疗费用压力,增加了家庭非医疗消费的支出。

表 7 异质性分析:政府医疗保障水平

样本	(1)	(2)	(3)
	全样本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群体性风险经历	-0.6732 ** (0.3206)	1.5288 (1.3590)	-0.8602 *** (0.3255)
医疗保障水平×群体性风险经历	0.1156 ** (0.0523)	-0.2558 (0.2217)	0.1480 *** (0.0531)
个体性风险经历	-0.1571 (0.2112)	2.0705 ** (0.8950)	-0.5544 *** (0.2144)
医疗保障水平×个体性风险经历	0.0663 * (0.0343)	-0.1751 (0.1452)	0.1074 *** (0.0348)
医疗保障水平	-0.0360 (0.1143)	1.2930 *** (0.4847)	-0.0319 (0.1161)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11717	11717	11717
R ²	0.684	0.506	0.708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5.3 城乡差异

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特征存在差异,居住在城市与农村的家庭在风险事件后面临的社会对家庭遭遇的反应也不同,因此,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会存在差异。不同于城市中封闭式居住方式和人群高流动性等特点,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绝大多数村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日常交往更为频繁,信息高度充分,因此,居住于农村的家庭更可能借助社会互动获得帮助,缓解重大风险的冲击。与此对应的是,表 8 回归结果显示居住于城市的家庭在经历个体性风险后,医疗费用的增加幅度更大。

表 8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样本	(1)	(2)	(3)
	全样本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群体性风险经历	0.0109 (0.0397)	-0.1158 (0.1683)	0.0242 (0.0404)

续表

样本	(1)	(2)	(3)
	全样本		
变量	总消费	医疗消费	非医疗消费
家住城市×群体性风险经历	0.0691 (0.0729)	0.4008 (0.3094)	0.0478 (0.0742)
个体性风险经历	0.2251*** (0.0331)	0.8208*** (0.1404)	0.0654* (0.0337)
家住城市×个体性风险经历	0.0472 (0.0395)	0.3500** (0.1675)	0.0720* (0.0402)
家住城市	0.0109 (0.0397)	−0.1158 (0.1683)	0.0242 (0.0404)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年和家庭固定效应	Y	Y	Y
样本数	12031	12031	12031
R ²	0.681	0.506	0.70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省略常数项。

6 结论和建议

本文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家庭风险经历事件研究的一个问题，即群体性的风险经历事件和个体性的风险经历事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不同。个体性的风险经历指单一个体经历的风险，如火灾、车祸、重大疾病、破产等。群体性的风险经历指群体都经历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台风、山体滑坡等。当家庭经历的风险事件是个体事件时，大多风险后果由家庭自身承担。当家庭经历的风险事件是群体事件时，更可能获得政府的救济，并与群体中其他家庭产生社会互动，从而做出与经历个体性风险的家庭不一样的消费决策。

基于此，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5轮非平衡面板微观家庭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影响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群体性风险经历和个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经历个体性风险后，家庭的总消费，尤其是医疗消费的增加更明显，而群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导致两者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救济的差异以及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产生的社会互动水平不同。政府的救助偏向于群体性风险经历家庭，并且群体性风险事件产生的社会互动更强，使得群体性风险经历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弱。进一步分析发现，抚养负担较重的家庭在经历群体性风险后，医疗消费也会出现上升；而政府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风险事件带来的医疗支出压力，使家庭在经历风险事件后更有余力增加非医疗消费；此外，城市家庭由于社会互动支持有限，在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后表现出更显著的医疗消费增加。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政府和相关部门更清楚地认清群体性风险事件和个体性风险事件

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政府更好地稳定市场和服务民生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为重大风险事件发生后政府救助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支持政府进一步优化救济政策,建立健全重大风险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灾后救助功能,并呼吁政府还应关注个体性风险事件,增加个人获取救助的渠道,如通过建立社区网格化的方法,鼓励经历个体性风险事件的家庭积极上报获取政府补助,从而避免其消费行为发生较大变化。其次,本文呼吁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关注“夹心层”家庭,并在该类群体经历重大风险事件时给予及时的关注。最后,本文鼓励政府和相关部门充分利用邻里、社区的互助功能和风险共担功能,积极构建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和谐社区,号召家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增加社会互动,提升家庭对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 程令国,张晔. 2011.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J]. 经济研究, (8): 119-132.
- Cheng L G, Zhang Y. 2011. Does famine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influence one's saving decision? A new explanation of China's high household saving rat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8): 119-132. (in Chinese)
- 郭士祺,梁平汉. 2014. 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49(S1): 116-131.
- Guo S Q, Liang P H. 2014. Social interactions, information channel and househol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2011 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9(S1): 116-131. (in Chinese)
-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 2009. 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 管理世界, (6): 52-60, 187-188.
- Li H Q, Fan C M, Jia J M, et al. 2009.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s and the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measures taken during unexpected calamiti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6): 52-60, 187-188. (in Chinese)
- 李涛. 2006. 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J]. 经济研究, (1): 34-45.
- Li T. 2006. Social interaction, trust,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 34-45. (in Chinese)
- 卢晶亮,冯帅章,艾春荣. 2014. 自然灾害及政府救助对农户收入与消费的影响:来自汶川大地震的经验[J]. 经济学(季刊), 13(2): 745-766.
- Lu J L, Feng S Z, Ai C R. 2014. The effects of natural disaster and government aid on th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Wenchuan earthquake[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3(2): 745-766. (in Chinese)
- 路晓蒙,李阳,甘犁,等. 2017. 中国家庭金融投资组合的风险——过于保守还是过于冒进? [J]. 管理世界, (12): 92-108.
- Lu X M, Li Y, Gan L, et al. 2017. The risk of Chinese households' financial portfolio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2): 92-108. (in Chinese)
- 汪小圈,张红,刘冲. 2015. 幼年饥荒经历对个人自雇选择的影响[J]. 金融研究, (5): 18-33.
- Wang X Q, Zhang H, Liu C. 2015.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famine experience on self-employment choic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5): 18-33. (in Chinese)
- 许荣,赵昶,常嘉路. 2020. 特别重大事故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资产配置实证[J]. 保

- 险研究, (12): 54-69.
- Xu R, Zhao C, Chang J L. 2020. Do extraordinarily serious accidents affect individuals' risk preference? — Evidences based on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J]. *Insurance Studies*, (12): 54-69. (in Chinese)
- 易行健, 张波, 杨汝岱, 等. 2012. 家庭社会网络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5): 43-51, 187.
- Yi X J, Zhang B, Yang R D, et al. 2012. The family social network and the rural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based on China's villag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5): 43-51, 187. (in Chinese)
- 章元, 黄露露. 2022.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城镇居民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2(1): 87-108.
- Zhang Y, Huang L L. 2022. Social network, risk sharing and household savings rate—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2(1): 87-108. (in Chinese)
- Bernile G, Bhagwat V, Rau P R. 2017.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1): 167-206.
- Campbell J Y. 2006. Household fin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1(4): 1553-1604.
- Duesenberry J S. 1949.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 1957.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M]//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37.
- Gao M, Liu Y J, Shi Y S. 2020. Do people feel less at risk? Evidence from disaster experi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8(3): 866-888.
-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2018. Time varying risk avers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8(3): 403-421.
- Hibbert A M, Lawrence E R, Prakash A J. 2018. The effect of prior investment outcomes on future investment decisions: Is there a gender difference? [J]. *Review of Finance*, 22(3): 1195-1212.
- Hoffmann A O I, Post T, Pennings J M E. 2013. Individual investor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7(1): 60-74.
- Hu Z C. 2022.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households' flood insurance decis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4(2): 414-432.
- Imas A. 2016. The realization effect: Risk-taking after realized versus paper loss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8): 2086-2109.
- Keynes J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 Luhmann N. 2017.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Routledge.
-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1954.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M]//Kurihara K.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Pool V K, Stoffman N, Yonker S E, et al. 2019. Do shocks to personal wealth affect risk-taking in delegated portfolio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2(4): 1457-1493.

Risk Event Experienc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Xiaomeng Lu¹ Yisheng Lu² Yaling Li³

(1.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Investment Banking and Strategic Clients, Sichuan Bank)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nd individual risk event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wo types of risk event experience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s behind it. Based on CHF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5-round unbalanced panel microdata, we conduct a detailed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PSM-DID method. We find that group risk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 risk experience have entirely different impact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ehavior. Households experiencing individual risk events exhibit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otal consumption, particularly in medical expenditure, whereas households experiencing group risk events do not display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r.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ack of sufficien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limited social interaction for households experiencing individual risk events are key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behavior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household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hanges i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fter risk events vary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support burdens, government medical security levels,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government relief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ositively affect households'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risks when formulating risk treatment measures.

JEL Classification D14, D91, R20